

职业教育越来越“香”是大势所趋

白锋哲

职业院校毕业生越来越抢手、一些学生主动选择上职校、职业教育让农家孩子找到成才的契机、接受职业教育不再被认为没前途……这些正在一步步从愿望变为现实，并将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现象。

可以预判，发展职业教育是大势所趋，我国职业教育正迎来大改革大发展的新阶段，迈上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快车道。

首先，国家层面大力推进。今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职业教育大会上做出重要指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5月10日，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发布《“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支持一批优质职业院校，建设一批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6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着力解决职业教育领域的突出问题。6月8日，人社部等五部委发布《关于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面向企业全面推行新型学徒制培训，人均补贴5000元/年。再加上2019年颁布的被称为“职教20条”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这些都一再表明，国家下定决心、大力气要加快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其次，产业发展上人才需求紧迫。在高质量发展大背景下，我国高技能人才占比低、缺口大。数据显示，我国技能人才已超2亿人，占就业总量的26%。然而高技能人才仅有5000万人，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与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相比有不小差距。其结果就是，企业快速发展却一“匠”难求，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据统计，2020年我国重点领域技能型人才缺口超1900万人，尤其是汽车行业“抢人大战”已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对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渴求，职业教育必须承担起更大重任。

再次，职教体系本身也在自强求变。拥有1.13万所职业院校、3088万在校生，在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之后，我国职业教育正在顺势而为、应势而起，向更优更强方向努力。针对产教融合不够深入、专业设置陈旧且同质化、吸引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不少职业院校对接市场需求，创新教学模式，探索“私人订制化”专业设置、“全生命周期”教育体系；聚焦行业，开放办学，积极

开发新产业、新职业方向的新教学内容，不断增强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和契合度。

最后，观念认知上正悄然转变。我国职业院校的多数生源来自农村，他们通过职业教育斩断了贫困代际传递的根子，也有很多人凭着一技之长实现了人生价值，赢得了人生出彩的机会。在看到有些职校就业率达到98%以上，不少职校生一毕业就拿到七八千元的月工资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职校毕业生同样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低人一等”的传统观念也逐渐瓦解，腰杆更直、底气更足正成为职校生的新形象。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产业，具有广覆盖、普惠包容的特点。既承担着培养“职业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责任，肩负着“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使命，又是为经济社会发展 and 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随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我国职业教育更是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这是因为，要促进共同富裕，一方面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那么，如何让众多低收入者

向中等收入迈进？重点要推动哪部分人群？答案是明确的，首先要让农民以及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提高收入。而要提高这一庞大群体的收入水平，就必须着力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素质，这就需要从源头上加强职业教育。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必须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将发展重心放在实体经济上。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现代产业体系，需要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要使“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大国制造”向“大国智造”转变，就离不开高质量职业教育的人才供给。

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顺应大势、拥抱大势是最有效的路径、最智慧的选择。不久的将来，当人们读懂了“职教”与“普教”两者只有“类型”之分，没有“层次”之别；当职业教育成为高技能人才“蓄水池”，真正“香起来、亮起来、强起来”；当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培养能工巧匠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人对职业教育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我们一定能看到，经过职业教育培训提升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人向中等收入群体靠拢。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2014年，国务院提出要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促使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一方面传统的金融机构向数字化转型升级，金融产品、金融服务数字化，另一方面，一些数字化金融服务形式兴起，各种借贷平台问世，数字金融市场活跃起来。

什么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

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数字普惠金融定义为，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为。《中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7》界定数字普惠金融是以数字信息技术、移动通讯中断基础的普惠金融方式。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理解成为数字技术方式下的普惠金融，其目的仍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金融普惠的目标。

农村金融需求小额、周期短、分散化等特征，使得农村传统的金融服务与需求不匹配，产生产品的逆向选择、行业发展的滞后、农民收入水平增加缓慢等多种问题，因此通过“数字+金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为三农问题服务，对打通“最后一公里通道”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字普惠金融，颠覆了传统金融的“二八定律”，具有网络外部性，可以从可得性、成本等方面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缺陷，助力三农问题的解决，催生数字金融市场的长尾效应。

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在三农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个切口：数字平台、数字产品、服务模式。例如：中国建设银行的“裕农通”、中国农业银行的“惠农e付”等围绕日常消费支付、便民生活缴费和投资理财的金融服务要求，所搭建的平台汇聚了支付、融资和消费等多种功能。个体网络借贷机构也为农业原料购置和农业生产经营贷款金额提供了金融服务。通过数字金融服务三农，可以更好地体现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公平性和共享性。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农民幸福感

当前，改变收入不平衡状况，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消除“金融排斥”。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网络技术，可以跨越金融机构的实体网点，突破金融服务的空间限制，不仅节省时间更节省成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帮助小微企业、个体获得平等机会。同时大数据的应用有利于对金融主体进行风险评估，并设计不同风险产品，不仅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更践行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目标，为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是农村当前金融体系的一个有益补充，有助于缓解“精英俘获”带来的不平等现象，有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资金供求的有效匹配和农业规模化智慧化发展。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可以提高农村普惠金融使用广度和深度，在农民问题上，对农民收入、消费、就业、创业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资本的流通，降低资本成本的同时，促进机会均等化，促进创业和就业，促进农村经济产业的发展，进而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增加农民的幸福指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贫困发生率。

数字普惠金融将促进农业发展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链模式整合，突破农产品产销的限制，推动农业数字化升级。依托数字技术和信息数据精准发展农业，创新三农金融服务模式，建立基于云计算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智慧农业，不仅能有效提升农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并且可以带动农业转型升级。通过信息技术和农业的结合，降低信息不对称现状，促进农业生产规模效应的形成，提高农村资本、土地、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流通和生产效率的提升，降低交易成本，降低风险。

河南省光山县青龙河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的“产、学、研、推”的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就形成了农业生态良好内循环，依托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数字技术，对农业生产进行赋能，同时形成数据反馈，不仅推动相关科研发展创新，更为农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促进信息共享，比如“一田两用、一稻两虾”的养殖模式的推广，对周边农业形成示范，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促进农业规模效应的形成。除此之外，山西省祁县万牧安格斯肉牛养殖基地、黑龙江北大荒等都通过智慧农业模式，实现了精准、高效、环保作物作业，提升作物产量、品质的同时，提高了土地的集约效率，提升了农业产值。

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乡村振兴

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共享性能更好地满足乡镇小微企业分散化和小额的资金需求，实现服务对象的下沉和多元化。以某金融科技为例，其与政府和金融机构建立的数据金融平台，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农户、返乡创业大学生、小微企业，并与村淘、农信等机构合作提供支付、借贷、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截至2018年年末其惠农服务已经为280余万农村用户提供了超过2500亿元的经营贷款。

同时，目前我国供给侧改革正在进行中，政府对三农领域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投入，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通过数字化产业链，可以发挥数字经济的长尾效应，降低成本，打破促进信息共享，带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增值，增加产业链的活力，助力乡村振兴。比如，江苏武进区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将翠冠梨的生产标准化，节省冷冻费用的同时，压缩了中间商赚取差价的空间。四川成都的“农货通”，通过简化流程，实现了快捷的销售模式。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面临的困难

虽然数字普惠产品呈现百家齐放场景，但是各类农村数字金融产品使用率并不高，一方面居民数字金融素养不高，通过数字金融服务平台获取贷款、支付、理财等金融服务的意识不足，互联网参与度低；另一方面，真正对口的三农金融产品比较少，许多平台都是从“城里”直接搬到“乡镇”，适用性不高，反而浪费资源，阻碍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和推广。

数字素养是数字农业、数字农村建设的基础。就目前而言，农村、农民、农业来看，数字基础知识、数字金融知识尚未普及，乡镇居民的数字素养仍有待提高。因而数字人才的培育和引进，是智慧农村实现“内部造血”的关键。这就需要农村教育的投入。但是，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产学研跨界人才培养机制仍不成熟，智慧农村、智慧农业的建设、发展、成熟仍需要时间。

同时，我国目前互联网覆盖范围不断提升，金融产品也不断推陈出新，但是金融服务、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等仍不够完善，不利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农民或者农村中小微企业进行评估并提供匹配的金融服务。比如传统银行机构在有些乡镇并没有设置网点，京东、淘宝的物流平台网点匮乏，并不能真正的“便民”，数字支付、消费等体系建设仍然不完善。

除此之外，与城市相比，乡镇的金融需求呈现出碎片化、小额化、周期短的特点，一直以来相关金融制度的建设都不够完善，因此增加了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的难度。比如不少P2P平台看到了机会，绕过政府的监管从事农村金融活动，发生了多起非法集资、诈骗的时间，严重损害了乡镇民众的权益，并且削弱了民众对普惠金融的信任，不利于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广度和深度。

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发展上升阶段，市场秩序建设、数字经济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都将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形成一定限制。比如智慧农业平台、农业物联网、农业信息库等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建设的举措，便会涉及到信息安全问题，何种数据应该共享，何种数据不能共享，这不仅涉及到市场公平、信息保护问题，更涉及到粮食安全的问题，因此法律桎梏必须加以突破。

农村普惠金融将普惠金融与三农问题融合，有助于提升农民幸福感、促进农业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但若想提高农村普惠金融的使用广度和深度，仍有许多困难需要突破，不仅包括金融产品的创新、市场秩序、信用体系、基础设施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数字素养的养成，这是智慧农村实现内部造血的关键。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

盘和林



作者：朱慧卿

“996”工作制违法吗？劳动者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近日，人社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第二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并给出了答案。一方面提示用人单位违法行为风险，促进依法规范用工；另一方面明确劳动者维权预期，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

在发布的案例中，某快递公司规章制度中“工作时间为早9时至晚9时，每周工作6天”的内容，严重违法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张某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安排，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不能据此认定其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故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某快递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律在支持用人单位依法行使管理职权的同时，也明确其必须履行保障劳动者权利的义务。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以及相应工作安排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否则就要承担违法后果。劳动者依法享有相应的劳动报酬和休息休假权益，并且要学会依法理性维权。

这正是：
用人单位“996”，小心员工“ICU”。
管理也应保义务，违法违规应当休。
文/铁锤

基层减负当“以上率下”

刘忠培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这是基层压力的真实写照。为了使基层干部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干事创业，各地纷纷响应中央减负精神，出台文件为基层减负。不过，有些地方看似认识清、决心强、力度大，但基层一线仍不乏苦不堪言的连轴转和留痕现象，部分基层干部反映，有的“收发文登记少，一堆文件没文号”；有的“大会减少开小会，小会记录满天飞”；有的“上级督查没多少，下级自查天天搞”；有的“一票否决责任状，评先评优全靠‘跑’”。基层负担重是长期形成的，积弊已久，警惕陷入形式

主义来为基层减负的恶性循环。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基层减负目的是营造基层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当务之急是将基层干部从无穷无尽的“无用功”中解放出来，从名目繁多的问责恐惧中解脱出来，从“虱多不痒”和少干少错的敷衍懈怠中跳脱出来。比如在乡镇一级，会议多、文件多、调研多、督查多、材料多、报表多……种种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负担，危害暴露在下面，而源头来自于上级。如果上面不担当尽责，以“层层传导压力”为名行“层层推责甩锅”之实，搞官僚主义，奉行“层层加码，码到成功”，那么

下面就可能滋生“级级注水，水到渠成”，如此一来基层负担就会源源不断产生。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基层减负当“以上率下”。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工作落实的组织者、推动者，应带头干实事、出实招、抓落实。应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坚决杜绝“只表态、不表率，只挂帅、不出征”的现象。对已部署的工作要保持定力、一抓到底、抓实抓细，不能停留于调查研究、议而不决，不能满足于交办批示、下发文件、开会布置。在开展作风建设专项整治行动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大幅精简文件和会议，

切实做到开短会、讲短话，改进各种督查检查考核和调研活动，确保基层减负落到实处、减出干劲。

制度管人，程序管事。要想根治基层负担过重的顽疾，除了在“官德”领域进行整治外，还要以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增强决策的可执行性；以提高简政放权的协同性落实治理资源下沉，切实解决权力下放衔接问题；重构建务实效、科学合理的工作成效考核评价机制。减负不减作为，松绑不能松懈。基层干部也要努力提高办事能力，改进工作方法，真正以人民为中心，为群众办实事，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来。

医养融合，农村需要大力发展

严国进

现阶段，各地城市社区健康养老服务机构已越来越多，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城市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需求。但据调查了解，农村健康养老服务还有待完善。

其实，农村老年人更需要健康养老服务，更应让医养融合“平民化”“农村化”。这是因为，一是相当一部分子女在外打工，无暇照顾老年人；二是不少农村老年人罹患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支气管炎等慢性慢性病以及老年心理疾患，亟需诊治，实施规范健康管理。

同时，各地相当一部分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还没有很好地开发、利用农村老年人医疗卫生保健资源。主要表现在：一是有些地区没有明确专门医护人员、生活护理人员，也没有开设专门老年病区收治老年人，负责提供老年人一日三餐，并专门聘请护理照料老年人及老年心理疾患，亟需诊治，实施规范健康管理。

院合一”，通过合理配置民生资源，探索医疗康养与养老深度融合、“互联网+健康养老”，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一是在医养康护一体方面，探索“两院一体”的新型医养结合模式，由敬老院和卫生院组成联合体，实行医疗机构托管敬老院，整合卫生、民政、慈善、医保、企业等多方面资源，实现医疗、养老、康复、护理无缝对接。卫生院医养中心内部区域设置上突出功能分区，设有治疗区、护理区、康复区、安宁疗护区，对不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实现分区管理，疾病加重时转入治疗区，病情稳定后又可转入康养区。

二是在互联网助力养老方面，面对不少农村老年人青睐居家养老状况，充分利用“互联网+健康养老”手段，由政府搭建智慧健康养老云平台，配备智慧随访访，打通居家养老的“最后一公里”。老年人在家通过智能手环、智能手表、远程心电图监测设备、智能血压监测仪、床头一键呼叫器等智能终端，可享受紧急救援、健康监测、健康管理、生活照料、远程访问、上门诊疗等服务。

三是在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一些地方建成多处口袋公园、小广场，方

便老年人开展广场舞、健身秧歌、太极拳等文体活动。当地卫生健康部门还举办健康大讲堂，帮助老年人了解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特定节日，志愿者服务队还会来到老年人身边，开展助老服务。此外，各医养结合机构与胶州市心理康复医院签订心理专科联盟协议书，设置心灵港湾，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心理咨询服务。

这些医养融合的举措，无疑让农村老年人生活更舒心，让农村老年人享受温暖的健康养老服务，拓展了农村老年人健康服务内涵，彰显了关爱农村老年人的正能量，为各地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本。

为了更好地激活农村老年人医疗保健资源，为农村老年人打造最短健康服务圈，做活、做新医养融合这篇文章，让农村老年人健康康康地安度晚年，各地都应多向医养发达的地区学习创新思维，在试点农村医养融合的基础上，尽快让医养融合在农村遍地开花。

当然，各地各级政府要唱好“主角”，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出台政策，加大投入，确保人、财、物、机构到位，更好地统筹

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资源，让更多的农村养老院设立定点卫生室，并通过互联网助力农村养老服务，确保农村老年人随时享受便捷低廉的医疗保健及生活照料服务。

同时，各乡镇卫生院也要充分正视现有病床利用率不高、有闲置病床的实际情况，开辟新的医疗服务市场，增设养老保健科室，设置老年病区、老年人家庭病房，“院中有院”，实施医养养老。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还能缓解养老机构供不应求、老年患者赖在大中医院不愿出院的现状。对辖区内养老福利院不能不闻不问，要主动上门与其建立业务协作机制，随时为其提供医疗保健及健康检查服务，为农村老年人增加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及健康随访次数。

另外，要调动现有农村家庭医生健康管理团队力量，在村（居）干部的配合下，调查、掌握、登记各村（居）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农村老年人清单，然后视病情分类实施“家庭病床服务”，并与其签订协议，定时上门实施零距离医疗、护理、康复治疗服务。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